

刺 刀 下 的 白 玫 瑰

(德) 里查·汉萨尔 著

于 智 元 译

王 志 佑 校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RICHARD HANSER
DEUTSCHLAND ZULIEBE

根据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2年版译出

刺刀下的白玫瑰

〔德〕里查·汉萨尔 著

于智元 译

王志佑 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29,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750册
统一书号: 10091·1042 定价: 1.55元

1

1943年2月的一个早晨，慕尼黑年轻的法学研究者雷欧·萨姆堡收到一封来信。后来他对人讲述这件事的时候说，打开信一看，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那个年头，每天都会带来新的忧虑和不安，以致人们的感觉往往象是麻木了。这时大战已进入第四年。战争使意外成为惯例，使惊恐变为家常。

尽管如此，当雷欧·萨姆堡拆开那封原以为平常的来信，手中突然出现一份传单时，他还是蓦然惊呆了。传单打印得干干净净，行距很小，没有插图，印刷上也没有任何花饰，全部内容都印在象教课书那样大小的一张规整的活页上。雷欧·萨姆堡飞快地读着传单，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清算的日子到了，这是德国青年对我们的人民曾经忍受过的最令人憎恶的暴政的清算……”

开始时，雷欧·萨姆堡的紧张情绪中夹杂着怀疑和惶恐。因为，眼前白纸黑字的这些话，是极其令人不安和震惊的。——不管人们内心是多么赞成这种观点。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赞成这种观点，就会招致象中世纪时期公开亵渎神明那样的结果。

雷欧·萨姆堡把传单翻过来，仔细地看了又看。难道这

是一份伪造的传单，是一个陷阱吗？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国家秘密警察散发出此类材料，然后潜伏起来，窥视收到材料的人是否向当局报告。如果不去报告，就会象印制传单一样被定罪。因为，这意味着，收到传单的人赞成其中的内容。这也就表明，他是国家的敌人，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马上被捕和受审。

可是，在慕尼黑大学完成了国家法学考试的萨姆堡很快又感到，传单上的这篇文章不会出自企图诱使公民犯罪的秘密警察之手。因为，文章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说服力。这只有通晓语言，而且对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以全德国人民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归还每个人所应享有的自由，它是德国人最珍贵的财富，希特勒用最卑鄙的手段把它从我们这里骗走了……”

传单的每一行都强有力地鞭挞着“世界大战的二等兵”^①的蹩脚战略，这个战略使德国人民在斯大林格勒的血泊中丧失了几十十五万^②名子弟。传单以无限的愤懑引用了宣传部长为让老百姓颂扬希特勒的功绩而发明的口头禅：“元首，我们感谢你啊！”

传单在快结尾的地方，满怀激情地发出了反抗号召：

“……如果德国青年不站起来，进行清算并同时赎去自己的罪过，不粉碎那些害人精，建立一个具有新精神的欧洲，那么，德意志这个名字就将永远蒙受耻辱……”

① 指希特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军的一个二等兵。 一译注

②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共损失三十三万人。这里指战役中死亡的人数。 一译注

雷欧·萨姆堡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寄来传单的信封，发现信封的右上角贴着一枚小小的带有阿道夫·希特勒头像的红色邮票。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嘲讽。信封上的地址和传单是用同一架打字机打印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传单寄给他呢？寄信人又是怎样弄到他的地址的呢？从信封上根本无法得知信是从何处寄来或是什么人寄的。传单折得跟一封信一样。雷欧·萨姆堡又把它按原样折好，然后从他工作室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厚书，把传单藏到书里。虽然他清楚知道，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可当他把书重新放回书架时，却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担心地看了看。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这个动作就是那有名的“德意志一瞥”——飞速地回头一顾，以便弄清是否有人盯梢。

雷欧·萨姆堡把传单看成是一个新的迹象，它表明，在慕尼黑平静的表面下，可能有某种一触即发的力量在集聚着——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了十年之后，这几乎是人们料想不到的。在此之前，萨姆堡曾是类似行动的见证人。一天早晨，当他来到学校时，发现清洁女工正在费力地把一些笔画粗壮的大字从墙上和大门入口的人行道上往下擦。天刚微明时，她们就奉命来干这件事了。因为当局希望，在第一批大学生来上课之前，能把这些煽动性标语清除掉。但是，用浓重的沥青涂成的大字使这种努力成为徒劳。大学生们来上课时，那些字虽然被弄得退了色，但是，“自由”和“打倒希特勒!!!”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学校当局对此既恼怒又慌张。他们立刻报告了慕尼黑的盖世太保。于是，盖世太保开始了紧张的侦察。不久，更糟糕的事情出现了。

收到那份煽动性的传单两天后，雷欧·萨姆堡象往常一样到学校去上讨论课。那天是1943年2月18日——这天将永远

留在他和许多人的记忆里，虽然很久以后他们才明白了这一天所具有的意义。起初，萨姆堡只注意到，快到中午时，教室前面的过道上很不安静，不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声。当讨论课结束时，整个学校都骚动起来了。人们议论纷纷，说是有几个大学生往过道和楼梯上散发传单，在把传单从楼上往门厅里撒的时候，被抓住了。在传单把它的腐蚀性毒素传染给大学生之前，已被管房人匆匆敛到一起，收存起来了。

在校长办公室里，散发传单的大学生受到盖世太保的仔细盘查。肇事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命运如何都暂时保密。报上也只字未提这件事。当然，这在宣传部控制舆论、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雷欧·萨姆堡了解到这件在学校里引起许多不安的事件的后果。事情发生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3年2月22日，萨姆堡习惯地到离司法官不远的一家小店买香烟。店主告诉他一些最新的传闻，说是今天上午将在司法官里审判一个非常案件，有一位法官坐飞机专程从柏林到这里来主持审判。

“他叫什么名字？”萨姆堡问。作为一名候补法官，他对此事很感兴趣。

“弗赖斯勒”。

萨姆堡吃惊地打了一声口哨。罗兰特·弗赖斯勒——臭名昭著的人民法庭的庭长，这个法庭只有出现叛逆罪和叛国罪^①时才开庭审判。

“被告是什么人？”萨姆堡又问。

① 德国的叛逆罪（Hochverrat），指攻击国家宪法，国家元首，危害国家秩序和安全罪；叛国罪（landesverrat），指危害国家对外安全罪，如出卖国家机密，帮助敌国等。

“有人对我说，是几个大学生”。萨姆堡把烟装到衣袋里，然后急忙向司法官走去。他知道，人民法庭正在那里开庭。他登上楼梯，向216号审判室走去。审判正在紧张进行。屋里坐满了人，早已座无虚席。于是，他只好在门跟前停下来。就是这样，也是他拿出候补法官证以后才得到允许的。

萨姆堡很快发现，审判不是公开的。只有得到正式邀请的人才允许进来。大厅里有许多穿制服的人：军灰色的国防军、黑色的党卫军和褐色的冲锋队。来自党和政府各级机构穿制服的人如此众多，这使萨姆堡意识到，由于某种他还不了解的原因，这次审判对德国首脑集团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整个场面都由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个人控制着。罗兰特·弗赖斯勒身着一件火红色的法衣，由于他动作的幅度很大，那法衣看上去就好似在风中飘舞的一面旗，不停地打着皱。象他前面一些穿制服的人一样，弗赖斯勒的右胸上也挂着一颗咄咄逼人的胸章：展开双翼的帝国之鹰，鹰爪里抓着一个花环，花环的中央是纳粹主义的“卐”字标志。法官帽子下面的那张脸僵直得成了一付阴暗的假面具。他大声吼叫，言词中充满威胁。他怒气冲冲，对着大厅使劲地高声宣读着起诉书：

“……叛国助敌，准备暴乱……”

“……号召破坏军火工业和瓦解国防力量……”

现在清楚了，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把人民法庭的庭长用飞机从柏林送到这里来，又为什么国家和军队的代表充斥法庭。弗赖斯勒在起诉中所宣读的各点，是战争时期对一个德国人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指控。从证明材料可以得知，起诉中所指控的可耻行动，是一个有着奇异名称的组织“白玫瑰”搞的，它的活动已有数日之久。起诉书一页接一页地把这个组织的活动罗列出来。它在地下印制了数千份传单，把传

单散发到许多城市，从而所谓极大地危害了帝国的安全。

弗赖斯勒甚至连点伪装的客观也撕掉了。他狂怒不已，大声吼叫；他为起诉火上浇油，而对辩护则置之不理。雷欧·萨姆堡把目光从穿着火红法衣的法官身上，慢慢移到被告席那里。这儿有三个人。虽然，他与他们并不相识，但在慕尼黑的音乐厅里，音乐曾使他们时常相遇，所以面孔也不陌生。他们是大学生，年轻、有教养、品行端庄——象他自己一样。很难使人想象，他们会坐在被告席上，等待着几乎可以肯定的死刑，而这死刑的原因，就是刚好三天前在学校发生的那件事。

在那时候，象散发传单这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却引起柏林首脑集团的极大恐慌。从国家的举动来看，似乎整个纳粹主义体系突然面临一场致命的威胁。而这个威胁不是来自东线红军的大规模推进，也不是预料中的西线登陆。相反，却来自三个年轻人——一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理应拿着书本在教室里读书，而不是被武装警察看守在司法官的216号审判室里受审。

使法官和起诉人最感不安的必定是下面这个事实：他们三个人都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教养和引导下长大的。从刚一进入青年时期起，国家社会主义就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塑造他们的世界观，用阿道夫·希特勒的观念和他的运动来培植他们的精神。他们三个人中有两个，也就是汉斯和索菲·绍尔两兄妹，曾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极为热心的成员。那时，汉斯是如此超群出众，以致他们曾挑选他，让他为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大规模党代会做队列旗手。索菲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在这个组织里，她也担任了领导职务。第三个被告，克利斯托夫·普洛卜斯特，同汉斯一样，也是德国国防军的卫生中士。对弗赖斯勒和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体

系来说，希特勒主义的三个如此“纯种”的门生会成为祖国的叛徒和敌人的帮凶，而今坐在被告席上，这简直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巨大打击和耻辱。

在罗兰特·弗赖斯勒咆哮着把他的起诉和辱骂从法官席上向下倾泄时，审判厅里大多数听众的目光都盯在那位姑娘的身上。所有人都等着她的意志被摧垮，表示悔过和乞求宽宥。可是她丝毫也没有这样。他们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失去常态，此刻，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也能感到，人们对他们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敬佩感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索菲。这并不是因为她是这一案件中的唯一女性，而是由于她那难以言喻的风韵。她21岁，棕色头发，周身环绕着一种奇异的光彩，在这光彩中既蕴藏着少女的天真，又蕴藏着她的严肃和深沉。人们看到，在审判过程中她不时地皱一下眉，这是她的一个典型的动作。即使在审判厅里，在她的生命处于严重危险的时刻，她的这个动作也不是恐惧和害怕的表示；它仅仅意味着，她在全神贯注地考虑某个问题，衡量它与其他问题的前后联系，力争在语气和色彩上正确地把它加以表达。

她穿着一件已经皱了的、剪裁得颇象男子式样的大衣，这件大衣同她的仪表不很相称。在盖世太保的监狱中，她经受了三昼夜几乎不间断的审讯。现在，她看上去已经精疲力竭。然而，这却没能损坏她的仪态的魅力，没能损坏她那半是少女，半是成年女子的风韵。她的面部表情和头部姿态说明，她怀有一种难于抑制的对抗情绪。罗兰特·弗赖斯勒气得浑身在绯红的法衣里颤抖，他很难理解，一个德国人怎么会情愿干出象起诉书中对这三个人所指控的那种可耻行为。索菲异常冷静，她泰然自若地回答他说：“总得有人开这个头。我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也正是许许多多入想的，只是他们还

不敢把它说出来罢了”。

法庭里出现一阵骚动，甚至罗兰特·弗赖斯勒也被弄得一时无言以对。汉斯·绍尔从一旁向妹妹投过赞同的目光，同时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微微点了点头。他象妹妹一样，也是棕色的头发；但是，兄妹俩与其说外表长得相似，还不如说在举止和个性上更相似。汉斯是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男子，年方二十五岁。他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着，中间成一波浪形。在过去三天里，他象索菲一样，经受了无休止的审讯和折磨。审讯过后，一个分工负责他的盖世太保官员偷偷地对自己的一个同事说：“我发现汉斯·绍尔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简练干练，象他这样的才华我以前几乎不曾碰到过。可惜，就目前的事态看，我没法帮他了。”

象从前在生活中彼此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样，现在汉斯和索菲两人又并肩坐在被告席上。人们感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在这种亲密的感情中，融会着兄妹之间的爱，融会着他们彼此间的钦佩和敬重。此刻看到妹妹在自己身边，这对汉斯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他曾一直努力，使妹妹脱离反抗阿道夫·希特勒政权的危险的地下工作。照他的愿望，她永远也不该知道他们的事。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使她得知了“白玫瑰”的秘密。此后，她就坚持要帮助哥哥和朋友们的工作。

还在刚刚被捕后不久，曾有人想给索菲一个机会，使她逃脱那几乎可以肯定的死刑。他们建议她，对反抗纳粹主义国家的叛逆行动表示遗憾和悔恨。这样的同情表示在盖世太保那里是罕见的。可是，这样做将意味着把哥哥丢下不管，同时也意味着将放弃自己所坚信的一切。因此，她马上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这种诱惑。

坐在汉斯和索菲身旁的是克利斯托夫·普列卜斯特，人们都叫他克利斯泰尔。他也是自愿在“白玫瑰”这一秘密名称下参加地下工作的。在他起草的一份传单中有一个警句，同时，也是一个纲领：“我们绝不沉默。我们要使你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白玫瑰要使你们心中不安！”^①克利斯托夫·普列卜斯特与汉斯和索菲结下了友谊，他同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理想，现在又面临着共同的命运。

由于一个偶然的不幸酿成了灾祸，使他此刻站在罗兰特·弗赖斯勒的人民法庭前。情况是这样的：盖世太保把一些撕碎的纸片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准确地对在一起，由此拧成了一个用以结束他的生命的绞索。与汉斯和索菲相反，普洛卜斯特从来没有在法西斯的诱惑面前上当。就是在希特勒青年团员们的行军队列象有什么魔力似地把许多人都吸引过去时，他虽然还未到成年，却没有为之所动。他宁可一个人去爬山，也不愿跟其他人一起齐步行军。这位宽肩膀，有着运动员体魄的大个子年轻人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他的思想好象在别处，而不是在这决定命运的地方。不管弗赖斯勒如何发作，也不管他怎样朝下吼叫，接连不断地提出针对这三个人的新证据，克利斯托夫·普洛卜斯特几乎全然无动于衷。

他是三个大学生中唯一结了婚的人。他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可是已刚好第三次做爸爸了。他的年轻的妻子正患产褥热躺在家里。盖世太保的罗网越张越大，在所有这几天身陷罗网的人里面，他的命运可能是最不幸的了。今天，他之所以在这里，那是因为他象汉斯和索菲一样，对他们说来，有一

① 这是第四期传单中临近结尾的一句话。它是针对当时德国老百姓盲目跟随希特勒而讲的。这期传单出现于1942年7月中旬。 一译注

种比逮捕、审判和处死更难忍受的事情——对一个完全违反常理人情的制度毫无反抗、苟且偷生，而这常理人情恰恰是人们文明相处的基础。

十分清楚，在审判过程中，对被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辩护。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对他们担当的任务表现出明显的厌烦情绪，而且丝毫不掩饰他们对给被告造成后果的那些行为的反感。审判结果本来也是确定无疑的。柏林把罗兰特·弗赖斯勒派到慕尼黑来，绝不是为了在这里宣布被告无罪而把他们释放。

尽管这样，雷欧·萨姆堡仍然发现，法庭里的人还是带着某种紧张情绪等待审判结果。确切地说，就是等待将要夺去三个被告生命的那几句话。象这样以紧张心情等待审判结果，在纳粹的审判中以前还不曾有过。意料之中的判决终于从审判席上宣布了：“……为了保护处于战斗中的人民和帝国，对人民法庭来说，只有一个公正的判决：死刑。在此，人民法庭确信，它同我们的士兵是完全一致的！”接着，罗兰特·弗赖斯勒在一片绯红的云里^①站了起来，在几个对审判毫无作用的陪审法官的尾随下，匆匆退离了审判大厅。

听众中的军人、党卫军和冲锋队还没有来得及散去，警察的警戒线就把被判决的人包围起来，扣上手铐带走了。他们把这三个人从法庭直接带往施塔德海姆刑场。当天下午，他们三个人就在慕尼黑的这所监狱中被砍头处死了。第一个走上断头台的是索菲。审判和处决是如此匆忙和残忍，人们由此可以推断出，在最高领导集团里存在着一种恐慌心理。

① 指弗赖斯勒的法衣。德语里有时用“在云里”比喻一个人靠想象办事，或过日子。这里影射弗赖斯勒的审判颠倒是非。 一译注

他们好象是在铲除一伙使用妖术和魔法的人，这伙人用可怕的咒语——“白玫瑰”的传单传播到帝国四面八方的违禁的言论——使整个国家体系受到威胁。对这三个青年的残酷杀害，使人想起了从前对异教徒的火刑和中世纪烧死巫女的行动——今天的野蛮处决却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欧洲的技术最先进之国。

“白玫瑰”事件给纳粹统治体系以沉重打击。这是因为，它使公众第一次了解到，存在着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有组织的反抗。一些青年人公然要冲破受到严密控制的一体化的国民大家庭。他们又偏偏来自这个政权从前认为是最可靠的那部分人。纳粹政权以前反复吹嘘，青年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特别是大学，这里可以说是培养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摇篮。可是恰恰在慕尼黑大学，在“运动的首府”^①，出现了第一条深深的裂缝。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政权真的建立在花岗岩上吗？在它的基础上会不会还有其他类似的裂缝呢？

随后发生的事件确实表明，这几个大学生的反抗绝不是孤立的。

2月27日，汉斯、索菲和克利斯托夫被处死五天之后，十二岁的比尔格特·胡贝尔一大早就在家里被门铃声从梦中惊醒。她家住在慕尼黑郊区的格莱夫丰。她醒来时刚刚六点半，外面的天色还很暗。比尔格特从窗口向外望去，只见花园的大门旁隐隐约约有三个男子的身影。

“谁呀？”她大声问道。

① 纳粹对慕尼黑的一种叫法。因为，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是从这个城市最早兴起的。 一译注

其中的一个男子应声回答：“你下来！”

比尔格特感到有些害怕。可是父亲还睡着，母亲又到乡下去了，所以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自己去问明这三个人的来意。她穿着睡衣跑下楼去。当她在花园门口看到这三个人时，更加感到害怕了。尽管这样，她还是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声：“您们有什么事呀？”

三个男人对她连理也不理，不容分说，一把将她推到一边。比尔格特对客人来访已经习以为常，来客大都是她父亲的学生。她想把这几个一大早到来的客人象往常一样带到会客室去。可这几个人却急匆匆地自己上了楼。比尔格特迅速从他们中间挤过去，跑到他们前面，直奔父亲的卧室。

“爸爸！”她大声喊着，“盖世太保！”

父亲突然惊坐起来，只见面前有三个陌生的壮汉，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床前。其中的一个说：“希特勒万岁，教授先生。请您让孩子走开。”

盖世太保官员花了几个小时，仔细地搜查了这所房子的所有房间。搜查中，他们把注意力特别放到教授的工作室。所有的抽屉都给他们打开了，翻看了各种材料和信件，把其中的一些放到纸袋中，另外一些则丢到一边。他们一边搜查，一边不时地向库尔特·胡贝尔提出一些问题。他们对他的态度还是恭敬的，因为他作为大学教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权要求得到敬重。

最后，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对胡贝尔说：“教授先生，现在劳驾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库尔特·胡贝尔把女儿叫过来，向她告别。他尽量使得这一离别象是正常的告别一样，做了平常告别女儿时所做的一切：亲吻她，抚摩一下她的头发，接着说了声：“再见。”

随后他们就把他带走了。十二岁的比尔·格特·胡贝尔满怀恐惧，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白玫瑰”青年叛逆者与库尔特·胡贝尔之间隔着一代人的距离。他已五十一岁了。除此之外，还有教授与学生，教者与学者之间始终存在的距离。也正因为如此，当国家权力机关发现，他同绍尔兄妹及其朋友们一起活动，并且象他们一样犯了颠覆罪和叛逆罪时，也就更加感到震惊。在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中，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深深的裂缝。在这个体系中，对一位教授所应发挥的作用规定得一清二楚。“……作为一名教授，特别是在这危难和战斗的岁月，更要致力于……促使青年坚定不移地绝对相信我们的元首、人民和帝国，使青年成为我们人民的坚强而富于牺牲精神的战士！被告胡贝尔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对胡贝尔的指控。

除上面提到的人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人被捕，其中两人惨遭杀害，他们的热血也洒在了斯塔德海姆的断头台上。这样，遇难者总计有六人之多。正如其中一位遇难者所说的那样，他们试图“……在暴政的坚壁上打开一个缺口……”因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盖世太保来抓维利·格拉夫时，他正在慕尼黑大学的宿舍里，与妹妹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这对休假的军人^①来说，是一种很少见的消遣方式。就象他不是标准的德国士兵一样，也不象是人们想象中的危险的煽动家和国家的敌人。相反，由于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反倒酷似传说中的有十倍

① 汉斯、维利等当时都被编入学生连，需要时，就到前线，不需要时，再回校学习。所以他们是学生，又是军人。 一译注

于他人力量的圣徒。那么，是什么促使他这样一个温柔内向的人，变成一个地下抵抗战士的呢？对此，他的一位朋友作过这样的解释：“被迫违背自己内心的信念而生活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维利之所以成为抵抗战士，正是这种折磨的结果。在六个牺牲者中，维利·格拉夫是最后一个被杀害的；他与死神搏斗的时间最持久。

从气质上来说，亚力山大·施莫勒尔与他的伙伴维利·格拉夫完全相反。他总是给人一种快活高雅的感觉。就是那单调的军灰色制服也丝毫损伤不了他的这种气质。他不象是这个制度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倒象是一个生活艺术家。然而，他在反抗斗争中却是不屈不挠的。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罪行的斗争中，他同汉斯·绍尔一道，是最早奋起者之一。

这六个人，为在“白玫瑰”的名义下同法西斯作斗争，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在斗争中，他们从来没有幻想过，单靠他们的力量就能击败强大的纳粹政权。半个世界不是正在用武器对付它，而今尚未奏效吗！他们无法预料，他们的秘密斗争会取得何种成果——如果说真能取得成果的话。但是，他们确信，他们不能象自己的许多同胞那样，再沉默下去了。沉默就是对这个残忍、腐败和最不道德的政权表示拥护。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感推动他们去行动。在慕尼黑的人民法庭前，索菲·绍尔一语概括了他们的反抗动机：“总得有人开这个头。”他们从未想过，为纪念他们，一些街道、广场和学校将会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地下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假若有人在他们开始地下斗争时对他们说，他们将得到上面提到的那种荣誉，那他们是不会相信的，甚至还会嘲笑这种说法。然而，在战争和接踵而来的各种事件所

掀起的巨浪平静以后，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戈劳·曼，^①却高度地评价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赤手空拳同大火搏斗，他们依靠自己的信念和那架简陋的印刷机，与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相抗争。这是不可能取胜的，他们的时间也很短暂。不过，在德国的反抗斗争中，即使只有他们，只有绍尔兄妹及其朋友们出现，也足可为讲德语的人挽回一些荣誉。”

2

正当盖世太保在慕尼黑对汉斯和索菲·绍尔进行初次审讯时，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在柏林体育宫安排了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问答仪式。这就是1943年2月18日在那里举行的群众集会。慕尼黑逮捕大学生与柏林群众集会这两件事之间，远远超出时间上的一致。

这两件事，各以自己的方式，典型地反映出任何独裁统治所赖以存在的双重基础：压制个人，操纵群众。来到体育宫的人们事先被告知，他们在这里要用震天的声音喊“是”，以对那个政权和它的政策表示拥护。汉斯和索菲·绍尔被关在慕尼黑的监牢里，这正是由于他们敢于大声地说出了“不”字。

^① 1909年生于慕尼黑。德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论家、教授。主要著作有《十九和廿世纪德国史》。 一译注